

# 契丹可突于被杀考

孟凡云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诸史记载契丹可突于对唐诈降,唐官吏趁机唆使其同僚李过折袭杀之。但经过考证,可突于被杀是唐将张守珪杀降冒功性质的行动。

关键词: 唐代; 契丹; 可突于; 被杀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1)05-0054-04

可突于(又称可突干)是8世纪上半叶契丹族大贺氏部落联盟政权中的实力派首领,时任大贺氏汗国衙官,非大贺氏成员。其勇悍有力,得众心,操控数位大贺氏联盟首领的废立。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被杀。诸史记载可突于对唐诈降,唐官吏趁机唆使其同僚李过折袭杀之,可突于以害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事实是否如此?可突于被杀之事内涉契丹各部势力的争权夺利,外涉唐朝、突厥力量的干预,其过程错综复杂,影响亦较大,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

记载可突于被杀之事的相关史籍主要是新旧《唐书》的《张守珪传》、《契丹传》和《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记载内容最为详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传首。时可突干连年为边患,赵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讨。守珪到官,屡击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诈降,守珪使管记王悔就抚之。悔至其牙帐,察契丹上下初无降意,但稍徙营帐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谋杀悔以叛;悔知之。牙官李过折与可突干分典兵马,争权不叶,悔说过折使图之。过折夜勒兵斩屈烈及可突干,尽诛其党,帅馀众来降。守珪出师紫蒙州,大阅以镇抚之,梟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sup>[1]6808</sup>其他两书记载也大致相同,尤其是可突于诈降、王悔说服李过折杀可突于、唐张守珪将之传首东都、得到大量封赏等内容完全没有异议。但仔细查看,在过程介绍中的某些细节还是有重大区别。

《旧唐书·张守珪传》记“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骁勇有谋略,颇为夷人所伏。赵

含章、薛楚玉等前后为幽州长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频出击之,每战皆捷。契丹首领屈刺与可突干恐惧,遣使诈降。守珪察知其伪,遣管记右卫骑曹王悔诣其部落就谋之。悔至屈刺帐,贼徒初无降意,乃移其营帐渐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将杀悔以叛。会契丹别帅李过折与可突干争权不叶”<sup>[2]3195</sup>。事情的经过是:可突于诈降——守珪知晓,派王悔前往——见到契丹无降意,移帐西北,引突厥杀悔。上引《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此相同,但未提守珪是否知悉契丹诈降的内容。《新唐书·张守珪传》的记载则完全相同<sup>[3]4549</sup>。

《旧唐书·契丹传》的记载略有不同:“诏以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丞以经略之。可突于渐为守珪所逼,遣使伪降。俄又回惑不定,引众渐向西北,将就突厥。守珪遣管记王悔等就部落招谕之。时契丹衙官李过折与可突于分掌兵马,情不叶,悔潜诱之,过折夜勒兵斩可突于及其支党数十人。”<sup>[2]5353</sup>经过是:可突于诈降,并回惑不定,移向突厥——守珪派王悔前往——王悔说服李过折杀可突于。《新唐书·契丹传》所记与此相同,语言更为简洁<sup>[3]6170</sup>。

正是这些明显不同的细节暴露了问题,现分析如下。

第一 行动顺序不同。《资治通鉴》和《张守珪传》是可突于诈降——张守珪知晓可突于诈降——派王悔“谋之”——王悔去后发现契丹“无降意”,并且移帐西北引突厥,将杀王悔——王悔采取离间措施。《契丹传》则是可突于诈降,而且态度反复,移兵投靠突厥。如此危险的情况下,张守珪派了王悔前往

收稿日期: 2011-05-16

作者简介: 孟凡云(1965—),女,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

E-mail: mengfanyun2004@sina.com

“招谕”并得以鼓动李过折杀可突于。实际上,不论是前者叙述的情境,还是后者提及的境况,张守珪在未做其他准备的情况下,派王悔前往契丹“谋之”或者“招谕”,这样深入虎穴的冒险岂非完全徒劳,甚或是送死?

第二,可突于移帐西北的目的不同。前者述可突于移帐的目的是引突厥杀王悔(王悔是行动标的),后者谈可突于移帐西北是行动,投降突厥是目的。在这两种情境下,王悔进入契丹营地后显然是不可能有多大行动自由的,怎么可能去做大量工作,说服李过折起兵杀可突于呢?按前者的说法,可突于若想杀王悔等使节,岂不是轻而易举,焉用率部移帐西北,密遣使突厥呢?杀一个王悔用得着这样大费周章么?难道契丹兵力弱小到杀使者的能力都需借助突厥力量?按后者情况,契丹既以投降突厥为目的,那又何必对唐诈降呢?在此之前其原本就是归顺突厥的。

在上述短短不足200字的事件过程的记载中,出现如此重大矛盾、漏洞和不合情理的叙述,说明文献记载肯定不真实。那么真实历史情况是怎样的呢?

## 二

笔者认为,事实真相应该是:这是一场大张旗鼓的杀降行为。

首先,可突于不是诈降,而是真正的降唐。张守珪事后在给朝廷奏报中的确是说可突于诈降。唐玄宗《答张九龄贺契丹贼可突干批》中说“用兵之上者,修政于庙堂,折冲千里之外,此之谓也。小寇适降,复为翻动。边军除翦,有国常刑。朕方事藉田,而今献捷。当铸剑戟以为农器也。”<sup>[4]403</sup>我们假定可突于确是诈降,那么可突于诈降目的何在呢?他会怎么做?恐怕他想要的绝不仅仅是杀几个唐朝受降使节(前述也不是为了归顺突厥),而是以诈降来麻痹唐朝,然后迅速采取行动对唐境进行大规模进犯,对唐军进行军事打击。尤其是在王悔进入契丹营地后,可突于手下必然会对王悔等进行严密监视,严格限制其行动自由,不会给王悔以可乘之机,更不会让王悔说服李过折,最后危及自己和大部分契丹族众的生命安全。前面已经叙述,可突于勇悍有力,得众心,前后操控数位大贺氏联盟首领(娑固、吐于、邵固)的废立,他绝对是一个狠角色,而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特别是假定可突于“诈降”的消息被张守珪提前知悉后,张守珪该怎么做?是做迎战准备,还是派王悔等前往契丹,自甘中计?王悔等使节到契丹后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什么样目的?王悔怎么保证一定能说服李过折起兵杀掉可突于呢?要知道,李过折实力与可

突于相差甚远(李过折杀可突于后不久,就被可突于余党所杀,说明李过折势力与可突于势力相差甚为悬殊)。可突于对于王悔到来既没有任何防范意识,也没有防范措施,他给予王悔在契丹部落内部充分的活动自由,这一切说明,可突于是真正降唐,绝不是诈降。

其次,可突于是背弃突厥后要求归顺唐朝的,不可能再向突厥求救对付唐朝。唐朝建立以来,契丹因为实力较弱,不足以自立,一直在唐朝、突厥之间依违不定,时而附唐,时而归顺突厥。其中,契丹归顺唐朝的时间比较多。为了明了契丹此次归唐的真实情况,有必要将历次契丹归顺唐朝的情况做一梳理。

契丹第一次归唐是贞观二年,从628-696年持续计69年。在此之前,契丹“本臣突厥,好与奚斗,不利则保入青山及鲜卑山”。贞观二年(628年),契丹君长摩会率其部落降唐。当时,突厥颉利可汗遣使向唐朝提出以梁师都交换契丹,被唐太宗拒绝。此后60多年,契丹一直接受唐朝册封。直到万岁通天(697年)年间,契丹孙万荣、李尽忠因不满唐吏侵侮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反唐运动,失败后契丹举众降突厥<sup>[2]5351</sup>。

契丹第二次归唐是开元三年,从715-730年持续16年。开元三年(715年),因突厥默啜可汗失势,突厥内乱,契丹再次举兵归唐。此时,契丹内部可突于独揽大权。这次归唐时间不长,因倍受唐吏欺凌,开元十八年(730年)可突于率众叛唐,降于突厥<sup>①</sup>。

契丹第三次归唐就是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的归唐。正是这一次归顺唐朝,可突于却被唐官吏王悔唆使李过折杀害。此前的5年,契丹归附突厥。5年中,突厥毗伽可汗及其重要辅臣左贤王阙特勤相继去世,又先后有伊然可汗、登利可汗即位,突厥政局不稳。尤其是登利年幼,其母“与其小臣沃达斯干奸通,干预国政,不为蕃人所伏。登利从叔父二人分掌兵马,在东者号为左杀,在西者号为右杀。其精锐皆分在两杀之下”<sup>[2]5177</sup>。这种混乱不堪的政局显然不是契丹归心之所。故可突于在受到唐吏欺凌被迫归属突厥仅仅5年后,又转而归属唐朝。

① 《旧唐书·契丹传》记载,开元十五年,“邵固还蕃,又遣可突于入朝,贡方物,中书侍郎李元宏不礼焉,可突于怏怏而去。左丞相张说谓人曰:‘两蕃必叛。可突于人面兽心,唯利是视,执其国政,人心归附,若不优礼縻之,必不来矣。’”可突于隐忍到了开元十八年方始降唐。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53页。

但中原史籍记载此次可突于归唐原因是“渐为守珪所逼”<sup>[2]5353</sup>，“守珪至官，频出击之，每战皆捷。契丹首领屈刺与可突于恐惧”<sup>[2]3194</sup>，投降唐朝。事实绝非如此。契丹三次归唐都是主动归附，却绝不是契丹受到唐朝武力威胁后主动归附（武力征服情况下归附、受到武力威胁后即归附，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恰恰相反，严酷压迫和军事镇压只能将属民越推越远。契丹之背离突厥如此，契丹两次背弃唐朝也是如此。而且，此次降唐，尽管可突于等无辜被杀，契丹实力损失惨重，但李过折等仍率契丹附唐，没有离去。直至天宝十年（751年），《新唐书·契丹传》说是在天宝四年，安禄山“诬其酋长欲叛，请举兵讨之。八月，以幽州、云中、平卢之众数万人，就潢水南契丹衙与之战，禄山大败而还，死者数千人”<sup>[2]5353</sup>。契丹被迫离去，但仅两年“至十二年，又降附”<sup>[2]5353</sup>。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每次契丹都是主动归附唐朝的；契丹归属唐朝的总时间长度，比其归附突厥的时间长度要长；每次叛唐而附突厥都是因为唐朝官吏的欺凌侮辱以及压迫。因此，契丹可突于这次归唐绝不是诈降，更不可能首鼠两端，没有定见的自掘坟墓的行为。

再次，张守珪接到可突于投降请求后，本应派人受降即可。但张守珪却捏造、篡改为可突于诈降，并进而制定了杀降和借刀杀人的对策，其阴谋诡计成功实施后，张守珪马上上功，得到唐中央政府的封赏。这个方面并无直接证据，但其他材料证明，这应是张守珪的习惯做法。

张守珪上任幽州节度使后，即决心以武力消灭奚族和契丹。“二十年（实为二十一年），张守珪为幽州节度，禄山盗羊事觉，守珪剥坐，欲棒杀之，大呼曰：‘大夫不欲灭两蕃耶？何为打杀禄山！’守珪见其肥白，壮其言而释之。令与乡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克获，拔为偏将。”<sup>[2]5367</sup>安禄山被张守珪处罚事发生在开元二十四年（737年）春，“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守珪亦惜其骁勇，欲活之，乃更执送京师。”<sup>[1]6814</sup>实际上，这时根本没有所谓的契丹“叛者”，此仍然是张守珪等纵兵偷袭契丹行为<sup>①</sup>。张守珪自己就是在这样一系列的杀降、偷袭契丹和奚族的事件中，走向仕途终点的。开元“二十六年（739年），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余烬于潢水之北，将践其禾稼。知

义初犹固辞，真陀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陀罗，逼令自缢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sup>[2]3195</sup>这些事件证明，张守珪既有灭契丹、奚族的决心，更经常将这决心落实到行动上。故而，开元二十二年（735年）张守珪派王悔等制造事端，杀可突于的行动就丝毫不值得奇怪了。当事件的开始和结束的两个阶段（可突于非诈降，王悔唆使李过折杀掉可突于）都已经确定，中间环节（王悔到契丹营帐后进行了挑拨教唆，李过折杀可突于后，王悔没有得到重赏，张守珪受封。这些事件的共同指向就是，张守珪定策杀降冒功，王悔是执行者）基本就没有太多异议了。

最后，关于事件过程和结果没有任何异议的。但李过折杀了可突于后，张守珪因何受封？的确，是张守珪派了王悔前往契丹受降，王悔唆使李过折杀掉可突于（至于其唆使的理由，以及李过折为什么会听从其唆使等，恐均将成为千古之谜）。李过折也在杀了可突于后，“自归”，投降唐朝，得到唐朝封赏。但张守珪的派人赴任之功，值得唐廷的大肆封赏（皇帝欲提拔其出任宰相）吗？“守珪使过折统其部，函可突于等首传东都。拜过折北平郡王，为松漠都督。”<sup>[3]6171</sup>“开元二十三年（736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马中郎李过折来献捷，制以过折为北平王，检校松漠州都督……上美张守珪之功，欲以为相。”<sup>[1]6809</sup>“二十三年春，守珪诣东都献捷，会籍田礼毕酺宴，便为守珪饮至之礼，上赋诗以褒美之。延拜守珪为辅国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余官并如故。仍赐杂采

① 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中华书局版，2004年，第442页：可突于二十二年六月被杀，二十三年正月李过折受封。夏，李过折被可突于余党涅里所杀。唐玄宗在四月的《敕契丹都督涅里》中封赏涅里。同书，第445页：唐玄宗在《敕乌知义》书中说：秋，突厥东侵，欲灭两蕃，“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谋，同破凶丑”。同书，第448-449页：二十四年初春，唐玄宗在《敕儿突厥可汗》的信中指责突厥，“然两蕃既归国家，亦即不合侵伐。”在《敕平卢节度、营州都督乌知义》书中说，“契丹及奚，一心归我，不有将护，岂云王略。”同书，第451-452页：直至当年秋冷，在唐玄宗《敕张守珪、安禄山》书中指出，“两蕃自昔辅车相依，奚既破伤，殆无遗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这些证明，契丹、奚族在开元二十四年初春，并无“叛者”。这些敕书见于《曲江集》和《全唐文》，岑仲勉做了细致分析，本文完全采用他的分析结论。

一千匹及金银器物等,与二子官,仍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sup>[2]</sup><sup>3194</sup> 毕竟李过折杀可突于属于契丹内乱。即便李过折将可突于、屈列的头颅交予张守珪转交唐朝,张守珪也不过是转手之功,再加上其派人得当之功,这些功劳是否堪当唐朝如此大力封赏?实际上,这种违规封赏当为张守珪就是杀降事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铁证。

值得一提的是,李过折墓志记载,过折杀可突于是他为唐玄宗分忧解愁而采取的行动。“唐故特进、松漠府都督兼同幽州节度副使、北平郡王李府君墓志铭并序,府君讳过折,字过折,其先阴山王之种,即虜族也。初以副相可突于执心倔强,太上皇忌之,府君知其故而为之谋,裒其首而献其可,然后率彼部落数千余人,咸挺身以许国,遂将命而归天。”<sup>[5]</sup><sup>77</sup> 墓葬是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迁葬于长安的,距李过折死时已有31年,故文中称唐玄宗为太上皇。其相关记载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此前,契丹归顺突厥,李过折也只是契丹牙帐的一个首领,尚未达到等同于可突于的地位,无了解唐玄宗意图的机会,也不可能接受唐玄宗的委托或者指令,更不可能与唐玄宗特别相知默契,为唐玄宗消除心头之患而将可突于杀掉。这只不过是中原王朝官吏在记载周边少数民族首领之活动时常用的口吻和词语,与张守珪开元二十三年对突厥作战胜利后在给朝廷奏报中对唐玄宗大加赞美性质类似,“斯皆圣德远覃,皇威遐振,事无遗策,举不失图”。不过,此点倒让我们察觉到王悔劝说李过折的蛛丝马迹,惜无旁证。

### 三

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各史籍对于可突于被杀事件记载中的矛盾、漏洞和不合情理的叙述,说明各史对事件的记载是不真实的。追根溯源,最初上报这一历史事件的奏折就是虚假的,捏造出来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提供这些虚假史料的人自然就是捏造行动受益者,张守珪是最大的受益人,其为始作俑者无可辩驳。当时契丹弱小,不得不在突厥和唐朝之间游移依违,这是弱者的生存本能所决定。不能

以此苛责契丹,要求他们坚定地归附突厥或者唐朝。开元二十二年,可突于降唐是真降,不是诈降,不是在降唐与归顺突厥之间的态度游移,更不是与突厥联合对付唐朝;张守珪接到可突于投降请求后,却将其捏造、篡改为可突于诈降,制定并成功实施了杀降和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杀掉契丹大批人马,张守珪得到唐中央政府的重重封赏。经过对事情细节的详细分析、考证和推论,可突于被杀事件实际上是唐朝边将的一次杀降冒功和借刀杀人行为。

实际上,不仅张守珪如此,当时唐朝幽州边境地区的大小官吏都习惯这样捉弄、诬蔑、嫁祸契丹和奚族,并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导致边境民族矛盾激化。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史思明在任互市牙郎时就成功地一次杀掉奚族军兵三百多人。“窆干尝负官债亡入奚中,为奚游弈所得,欲杀之;窆干给曰‘我,唐之和亲使也。汝杀我,祸且及汝国。’游弈信之,送诣牙帐。窆干见奚王,长揖不拜,奚王虽怒,而畏唐,不敢杀,以客礼馆之,使百人随窆干入朝。窆干谓奚王曰‘王所遣人虽多,观其才皆不足以见天子。闻王有良将琐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琐高与牙下三百人随窆干入朝。窆干将至平卢,先使人谓军使裴休子曰‘奚使琐高与精锐俱来,声云入朝,实欲袭军城,宜谨为之备,先事图之。’休子乃具军容出迎,至馆,悉坑杀其从兵,执琐高送幽州。张守珪以窆干为有功,奏为果毅,累迁将军。后入奏事,上与语,悦之,赐名思明。”<sup>[1]</sup><sup>6817</sup> 安禄山更是如此。“张守珪以禄山为捉生将,禄山每与数骑出,辄擒契丹数十人而返。”<sup>[1]</sup><sup>6817</sup> 安禄山“与史思明俱为捉生。知山川水泉处,尝以五骑禽(擒)契丹数十人。”<sup>[3]</sup><sup>6412</sup> 天宝四载(745年),“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禄山讨破之。”<sup>[1]</sup><sup>6868</sup>

正是在这些人制造的不断冲突和战火中,唐朝输血般地不断强化着边防力量,给予边防藩镇节度使政权、兵权和财权,最后形成了尾大不掉的藩镇格局势力,唐朝统治也随之受到严重破坏,并走向灭亡。

#### 参考文献:

- [1]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2]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3]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4]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5] 葛承雍. 对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的解读[J]. 考古, 2003(9).

(责任编辑 李吉和)